

胜利逻辑与非理性时刻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及其自由主义批判

俞佳儒

摘 要 约翰·米尔斯海默出版新著《大妄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后，尚没有研究对它与米氏的学术历程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米尔斯海默早年间并没有现实主义的明确意识，他的现实主义传统来自于结构现实主义。为了回答冷战终结提出的时代问题，他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立场并引入摩根索的理论，从而构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大妄想》则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的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回应。虽然《大妄想》在理论内容上没有新意，但是它基于贯穿米氏学术历程的“胜利逻辑”，通过将美国划入“非理性时刻”，把这一异常现象排除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从而为他的理论辩护。通过讨论“胜利逻辑”和“非理性时刻”可以提供超越现实主义理论的启示。

关键词 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国际关系理论；胜利逻辑；理性假定

一、问题的提出

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安全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并被认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①2001年，米尔斯海默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① 米尔斯海默不是唯一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埃里克·拉布斯（Eric Labs）等也具有进攻性现实主义倾向。拉布斯的理论更靠近米尔斯海默的结构理论（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4, 1997, pp.1-49）。而扎卡利亚提供的则是政府中心主义的。关于扎卡利亚和米尔斯海默的区别，参见李永成：《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以下简称《悲剧》），系统阐述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①引起了学界对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再讨论。2018 年，他出版了《大妄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以下简称《大妄想》）^②，再次引发了各界对于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关注。

如果说《悲剧》从正面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那么《大妄想》则更多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从侧面印证现实主义（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内容上看，《大妄想》的自由主义批判并没有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内容进行更新。但是，《大妄想》的切入角度毕竟与《悲剧》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从理论内容方面对它进行评价，而要考察新的角度在相同的理论内容下，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什么。因此在米尔斯海默出版新著后，除了进行书评式的评论，^③还需要把《大妄想》放回米尔斯海默的学术历程和理论体系中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大妄想》中的自由主义批判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关系。

本文将首先回顾学界对米尔斯海默及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尽管已有研究为我们理解米尔斯海默和他的理论提供了启示，但相关研究基本停滞于《悲剧》时代，距今已有十数年。新文本的出现要求新研究的跟进，《大妄想》要回答的问题与《悲剧》的时代已经有所不同。于是本文将在“时代问题”与“理论回应”的框架下，以《悲剧》和《大妄想》为核心梳理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体系。不过在此之前，本文将简要回顾米尔斯海默的学术起点，以确定他理论体系的原点。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胜利逻辑”是贯穿米尔斯海默理论体系的，而《大妄想》所讨论的就是在“胜利”的结构条件下，处于“非理性时刻”的美国的行表现，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2014 年出版英文修订版。中译本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中译本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中译本将标题中的 *delusion* 译为“幻想”，但实际上 *delusion* 更接近汉语中“错觉”“妄想”。

^③ 目前对《大妄想》的典型的书评可见 Aaron Ettinger, “Book Review: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issue 5, 2019, pp.671-675; C. William Walldorf,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By John J. Mear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28p. \$30.00 Cloth.”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8, issue 3, 2020, pp.893-894; 李卓：《“自由霸权主义”为何注定失败——简评米尔斯海默〈大妄想：自由主义理想与国际现实〉》，《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 年第 2 辑，第 237-244 页；王广涛：《自由主义霸权的幻想与悖论》，《世界知识》2020 年第 13 期，第 71 页。

这种表现事实上是外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后，本文将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简要讨论“胜利逻辑”和“非理性时刻”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对于米尔斯海默及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已有研究往往从学术传统与历程、核心概念与假设、逻辑与现实批判等角度展开。

在学术传统与历程方面，李永成的《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对米尔斯海默 1983 年第一本专著《常规威慑论》（*Conventional Deterrence*）、1988 年《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1990 年的论文《退向未来：冷战后欧洲的不稳定》（*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和 2001 年《悲剧》等核心文本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考察了《悲剧》对修昔底德（Thucydides）、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现实主义先驱的引用情况，以此展现米尔斯海默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①在《大妄想》出版后，作者沿着米尔斯海默的路径对美国的自由霸权主义进行了实证研究，^②但尚没有将《大妄想》纳入米尔斯海默理论的系统研究。

更多的研究把关注点放在了米尔斯海默的核心概念与假设上。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安全、威胁、权力与恐惧等现实主义的经典概念与假设上，并倾向于将其与其他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比较。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认为米尔斯海默关注冲突的可能性（mer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s），而罗伯特·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则关注攻击的概率性（probability of aggression），因而米尔斯海默会认为国家总是在做“最坏打算”（worst-case）。^③其他学者则关注安全（security）、恐惧（fear）等概念在米尔斯海默理论假设中的位置。格伦·斯内德（Glenn H. Snyder）则认为米尔斯海默理论必须加上“国家非常关注安全”这一假设才能成

^① 李永成：《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此外，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传统中的位置的研究还有邹函奇：《现实主义谱系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5 期，第 254-256 页。

^② 参见李永成：《特朗普对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5 期，第 26-33 页；李永成：《冷战后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战略：自由霸权主义及其限度》，《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27 辑，2020 年，第 99-119 页。

^③ Stephen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3, 1997, pp.445-477.

立。^①但是唐世平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区分并不是对权力/安全的不同追求，二者真正的区分在于对不确定性和恐惧的不同处理。^②他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恐惧”概括为“对其他国家的意图做最坏打算”，并认为只有增加这一假设才能得出米尔斯海默的结论。^③从某一概念入手研究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对其理论的某些细节的深入理解，同时可以揭示出其理论中的重要部分。理解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为米尔斯海默后来的自由主义批判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正面阐述之间是有关联的，^④因而在考察米尔斯海默的自由主义批判在其理论体系中的位置时，需要注意它与“恐惧”等核心概念之间的衔接。

最后一种研究主要是批判取向的。一些研究热衷于否定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并非全球霸权（global hegemon），但是历史上唯一的地区霸权（regional hegemon）。^⑤克里斯托弗·莱因（Christopher Layne）强烈批评米尔斯海默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否认，认为这是他论证的不足之处。^⑥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更是称《悲剧》“虽然很有智慧，但也充满胡言乱语（nonsense）”，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评价不高。^⑦也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批判米尔斯海默关于“权力最大化”的判断。^⑧

由于米尔斯海默基于其理论预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因而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以批判为主。例如，苏长和认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对

^①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1, 2002, pp.149-173.

^②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19. 不过，这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作为理论的描述性、解释性被削弱了。此外唐世平认为曾出现过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安全战略指导的世界，这种战略选择是社会演化的结果，并且具有时代性，参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董杰旻、朱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第 140-150 页；李江春：《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1 期，第 99-123 页。。

^③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3, 2008, pp.451-471. 其他关注恐惧在米尔斯海默理论中的位置的研究有 Arash Heydarian Pashakhanlou, *Realism and Fea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rgenthau, Waltz and Mearsheimer Reconsidere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④ 米尔斯海默在《大妄想》中的自由主义批判是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的，而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米尔斯海默版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⑤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41.

^⑥ Christopher Layne,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2, 2002/2003, pp.120-164. 莱因把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称作“节制进攻性现实主义”（diet offensive realism），并把认为大国追求全球霸权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称作“强健进攻性现实主义”（robust offensive realism）。

^⑦ Andrew J. Bacevich, "Book Review: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arameters*, vol.32, no.2, 2002, pp.124-126.

^⑧ Brandon Valeriano,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Testing Aggressive Power Politics Model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5, issue 2, 2009, pp.179-206.

摩根索和华尔兹的重复。^①更多的批评集中在米尔斯海默极度的悲观论、循环论和宿命论，^②以及他对现实的过度简化等等。^③这些批评对我们理解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底色是有益的，同时也提示我们可以从悲观论、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视角考察米尔斯海默的自由主义批判。事实上，《大妄想》呈现出了米尔斯海默的悲观论和循环论遭遇乐观和进步的自由主义时产生的强大张力。

三、分析框架：时代与理论

对于米尔斯海默理论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其《悲剧》出版后的数年间，距今已有十数年。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是有很强的现实观照的，他 1990 年发表论文《退向未来》和《为什么我们很快就将怀念冷战？》（*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并逐步通过《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和《一个现实主义的回应》（*A Realist Reply*）逐步建立并推出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时，^④世界正是冷战终结的时代，他的作品的核心关切就是冷战后的安全问题，并回应当时流行的“冷战结束带来和平”的论调。而他出版《领导人何说谎：国际政治中的撒谎的真相》（*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⑤和《大妄想》时，正是美国如火如荼开展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并开始受到挫折的时代。^⑥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写就于不同的时代，在新的时

^① 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及其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4 期，第 73-76 页。

^② 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及其思考》；赵银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非现实主义”逻辑——兼论美国东亚战略的困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 年第 1 期，第 54-59 页；赵可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及其批判》，《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第 131-140 页；吴金平、谭笑：《浅析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第 96-100、108 页。

^③ 王文峰：《现实主义的反思——〈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评介》，《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12 期；余建军：《悲观来源于何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现实简化与权力逻辑》，《欧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34-48 页；范菊华：《盲人和象——评〈大国政治的悲剧〉、〈权力政治入门〉和〈必然就是道德〉》，《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76-80 页；

^④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p.5-56;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66, no.2, 1990, pp.35-50;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4/1995, pp.5-49;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82-93.

^⑤ John J. Mearsheimer, *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事实上，正如该书中译本《为什么你的政府会说谎？》的标题所体现的那样，它讨论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政府为何会为了国际政治目的而对国内说谎的问题，米尔斯海默自己也认为，国际上的说谎是比较少见的，他难以找到充足的案例。

^⑥ 在《领导人何说谎》之前，米尔斯海默与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还出版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一书。但该书主要是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比起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更多的是外交决策机制的研究作品（事实上其理论化水平也不高），因而不在于本文的考虑范围内。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the U.S.*

代问题下，同样需要对米尔斯海默对新问题的新回答进行新研究。因此，本文将以《悲剧》和《大妄想》两部较为成熟的作品为核心，以“时代问题”与“理论回应”的方式分析米尔斯海默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

同时，米尔斯海默的作品也具有相当强的连续性，自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开始，他的几乎所有作品就都围绕着安全问题展开，而安全问题则是现实主义者的大本营。一般认为，米尔斯海默的立场是极度现实主义的。^①但是，米尔斯海默自己却称，他在研究生院学习时（1975-1980），没有关注所谓“主义”（isms），其中就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据他本人回忆，当时的国际关系教育中现实主义的先驱启示是备受忽略的。^②因此，有必要首先简要回顾其学术历程，讨论米尔斯海默是如何接近现实主义的，从而在“时代问题”和“理论回应”的梳理中发现其思想背后相对“不变”的成分。

四、军事战略研究与模糊的现实主义传统

1970 年米尔斯海默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正是在西点军校的三年级，他开始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产生兴趣。^③从西点毕业后，他在美国空军服役五年，1975 年起赴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求学，并于 1980 年获得博士学位。^④在康奈尔，米尔斯海默的两位导师分别是乔治·奎斯特（George H. Quester）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奎斯特的代表作《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讨论了国家何时会选择进攻这一问题，也就是常规威慑（conventional deterrence）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罗斯克兰斯的讨论课上，他建议米尔斯海默研究常规威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米尔斯海默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常规威慑论》。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中译本见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

^① 秦亚青：《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氏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9 页。

^②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no.1, 2006, p.107-108.

^③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pp.105-106.

^④ 关于米尔斯海默的经历，参见其个人网页：<https://www.mearsheimer.com/biography/>。

1、《常规威慑论》与《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

《常规威慑论》关注的问题与奎斯特类似，即：为什么面临大规模战争的国家会/不会选择进攻。^①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就是阻止对方进攻的威慑何时能够成功。米尔斯海默则指出，威慑的核心是让进攻方对进攻后果感到恐惧。在这里，米尔斯海默已经开始了对于“恐惧”的强调。

米尔斯海默的回答直接挑战了导师奎斯特的观点。奎斯特强调武器性质对于战争决策的影响：虽然在一方实力高于另一方的情况下，实力强的一方更可能选择进攻；但如果双方实力接近，那么如果进攻性武器占优，则双方均更可能进攻，相反如果防御性武器占优，则双方都更可能不进攻。^②也就是说，威慑被视作了武器系统的函数。^③除了奎斯特的观点，另一种解释则把威慑被看作了双方实力对比的函数。^④米尔斯海默认为威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军事行动成本和政治风险（或收益）之间的平衡。如果双方实力对比和地形允许进攻方采用闪电战迅速击溃敌人，那么威慑很可能失败；相反，如果进攻方预估自己会被拖入更本高昂的消耗战，那么威慑很可能成功；如果进攻方不寻求击溃对方，那么威慑就很难评估。^⑤而在最终决策中，如果领导人选择不开战会面领很高的政治风险，那么其能接受的成本上限会提高，即便陷入消耗战也会不惜一切发动进攻，威慑也随即失败。^⑥

在写作《常规威慑论》的过程中，米尔斯海默对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的闪电战等战略思想产生了兴趣，1988 年出版了《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回顾了李德·哈特的军事和战略思想。一战结束后哈特的早期思想是要寻找一种新的进攻方式，因为“他认识到，一场成功的防御无论实施得多么出色，也不可能取得快速的决定性胜利。只有进攻才能获胜。”^⑦然而哈特对于英国所谓大陆承诺^⑧的反对，使得哈特最终成为了“防御在战场上总是胜过进

^① 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

^② 乔治·H. 奎斯特：《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③ 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25.

^④ *Ibid*, p.27

^⑤ 如果有限的冲突很可能发展为消耗战，那么威慑的成功率就会升高；相反如果消耗战的可能性较小，威慑成功率则会下降。但是有限冲突不常见，米尔斯海默将其归因于民族国家对于击溃对方的偏好，参见 *Ibid*, p.63。

^⑥ *Ibid*, pp.28-66.

^⑦ 约翰·米尔斯海默：《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齐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8 页。

^⑧ 大陆承诺，即面对欧洲大陆的侵略性敌人，英国是否要建立一支庞大的陆军在欧陆战斗。

攻”观点的支持者。^①而米尔斯海默就是要指出，二战中的英国在过分强调防御的哈特的影响下犯下了错误。可见，米尔斯海默对于哈特后期的思想颇有微词，正是通过揭示哈特的错误，米尔斯海默强调了“进攻”的重要性。^②

2、模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

可以看到，在米尔斯海默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1990 年以前），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军事战略的研究而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这一阶段，米尔斯海默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书评和评论也基本讨论较为具体的军事战略甚至军事史问题。^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1982 年米尔斯海默赴芝加哥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理论，系统阅读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并逐步产生了现实主义的身份认同。^④由于《常规威慑论》的构想来自其研究生时期的课程论文，当时米尔斯海默甚至没有读过摩根索和卡尔的著作，^⑤所以至少在《常规威慑论》中，我们看不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子。然而，即便是 1982 年后的论文里，也很少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但这些作品也确实反映了部分现实主义的色彩。例如将威慑与恐惧结合、强调战略选择中的损益分析、对于实力/权力的重视等等。“恐惧”在他后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战略选择中的损益分析背后隐含着国家或者军事决策者的理性假设，而理性假设也成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关注安全问题，所以总体符合现实主义阵营，但他没有过多考虑这一归属问题。^⑥至少从米尔斯海默的早期学术生涯来看，尽管他的著作带有现实主义色彩，但他背后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是相对模糊的。或者说他的现实主义背景不具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

^① 同上，第 6 页。

^② 李永成：《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第 31 页。

^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British Generals Talk: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1, 1981, pp.165-184; “Maneuver, Mobile Defense, and the NATO Central Fro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3, 1981/1982, pp.104-122; “Why the Soviets Can’t Win Quickly in Central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1, 1982, pp.3-39; “The Military Reform Moment: A Critical Assessment,” *ORBIS*, vol.27, no.2, 1983, pp.285-300; “The Case for Partitioning Kosovo,” in Ted Galen Carpenter ed., *NATO’s Empty Victory: A Postmortem on the Balkan War*,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0; “Book Review: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6, no.4, 1984, pp.710-711; “Nuclear Weapons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3, 1984/1985, pp.19-46; “Prospects fo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n Europe,”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41, no.7, 1985, pp.158-162; “A Strategic Misstep: The Maritime Strategy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1, no.2, 1986, pp.3-57; “Numbers, Strategy, and the European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 no.4, 1988, pp.174-185; “Assessing the Conventional Balance: The 3:1 Rule and its cr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3, no.4, 1989, pp.54-89.

^④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p.108.

^⑤ *Ibid.*

^⑥ *Ibid.*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米尔斯海默的军校生涯或许影响了其今后作品的风格。尽管他否认军校出身把他吸引到了安全问题，并且他本人非常讨厌军事，^①但他早期的学术研究始终与军事息息相关，并且他后来也从没有跳出过与军事相关的安全领域。因而他在《常规威慑论》和后来的著作中强调地形因素对安全的影响，也离不开他超出一般国际关系学者的对军事的了解。

五、时代问题与理论回应：冷战后的米尔斯海默

80 年代末，苏联改革陷入困境和东欧发生的剧变似乎预示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国际形势变化的意义超越了冷战时期典型的“紧张—缓和—一再紧张—一再缓和”的循环，^②世界似乎将要进入新的时代。后冷战的新时代提出了更为重要的新问题，就是在新的时代问题下，米尔斯海默转变了学术研究的取向，从具体的军事战略问题转向了较为抽象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安全理论），对新的时代问题进行自己的理论回应，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论回应的产物。

1、时代问题：冷战结束与欧洲安全的未来

对于米尔斯海默这样的国际安全研究者来说，冷战结束提出的时代问题就是：冷战的终结提高还是降低了战争的风险。^③具体而言，米尔斯海默在 1990 年发表的两篇论文《退向未来》和《为什么我们很快就将怀念冷战？》中考虑的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的走向。

后冷战的欧洲会走向战争和不稳定，还是会走向和平与稳定？米尔斯海默识别出对此问题作出乐观预测的理论，即战争过时论、经济和平论和民主和平论，并逐一进行了批驳。^④

2、理论回应：大国政治的悲剧

相比于三种乐观理论对于非权力因素和非结构因素的强调，米尔斯海默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悲观预测。他认为，由于国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anarchy），没有一个更高的实体能够提供安全，因此每个国家必须以自助

^① *Ibid*, pp.105-106.

^② 这也是冷战史的一种经典叙述方式，如朱明权：《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

^③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p.6.

^④ *Ibid*, pp.40-51.

(self-help) 的方式保障生存。这种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必须将自己的相对权力最大化, 这种最大化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①

而无政府状态下和平与战争则取决于结构因素——军事实力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military power), 也就是所谓的“极” (polarity)。^②从实力结构的角度出发, 米尔斯海默论证了两极结构的稳定性和多级结构的不稳定性。^③相比于多极结构, 两极结构的冲突组合少, 失衡较少因而威慑更容易成功, 以及对对手的误判较少, 因此更加稳定。^④正因如此, 冷战期间欧洲的“长和平”在于美苏两极提供的稳定结构; 如果冷战结束后美苏的力量撤出欧陆, 在欧洲缺少有效核威慑的情况下, 会从两极走向多极, 战争的风险反而会升高。^⑤这也是为什么米尔斯海默说“我们很快会怀念冷战”的原因。^⑥

从《退向未来》开始, 米尔斯海默的研究基本进入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在《退向未来》中, 米尔斯海默的结构取向可谓直接来源于华尔兹。华尔兹的结构理论中指出了体系的三个特征: 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相似的行为体和实力分布。^⑦而米尔斯海默则直接继承了华尔兹对于国际体系的理解, 并把实力分布作为唯一 (至少是决定性) 的自变量。

《退向未来》基本奠定了此后米尔斯海默理论研究的结构方向, 而《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则在结构取向中吸收了更多摩根索的思想。尽管提到了相对权力, 但《退向未来》中摩根索的位置是相对边缘的。^⑧而《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对三种制度理论 (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和批判理论) 的批评不仅借助了华尔兹的结构取向, 还更多地运用了摩根索的思想。^⑨根据米尔斯海默自己的描述, 他虽然认同华尔兹的结构取向, 但认为华尔兹的理论与他对国家行为的观察不一致, 从而产生了理论上的不满。^⑩这时, 米尔斯海默发现他十分赞同摩根索关于相对权力和权力最大化的思想,^⑪并继承了摩根索推出的权力争夺的普遍性的永恒性

^① *Ibid.*, pp.12.

^② *Ibid.*

^③ 支持多极稳定说的代表是卡尔·多伊奇 (Karl W. Deutsch) 和大卫·辛格 (J. David Singer)。Karl W.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vol.16, no.3, 1964, pp.390-406.

^④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p.14.

^⑤ *Ibid.*

^⑥ John J.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⑦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⑧ 仅引用摩根索 1 次。

^⑨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⑩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p.110.

^⑪ *Ibid.*

的判断。^①他从权力最大化和相对权力等方面出发，结合无政府状态的论述，指出国际制度并不能保证安全。^②然而，米尔斯海默得出这一结论的方式与摩根索不同。摩根索通过对人性的考察得出的结论，米尔斯海默从结构角度进行了“科学”的论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海默在《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中公开宣称自己的理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并称摩根索也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③

总之，对于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米尔斯海默而言，最直接的理论和思想来源就是华尔兹；在对华尔兹不满的基础上，他引入了摩根索的结论（而非方法）。因此，虽然米尔斯海默身处现实主义传统，但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等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经典作家或许并没有直接启发米尔斯海默。至于霍布斯，后来米尔斯海默的《悲剧》甚至没有一次直接引述。^④

面对米尔斯海默的批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和约翰·鲁杰（John Gerald Ruggie）等制度主义者、集体安全论者和建构主义者组织了反击，^⑤但不过是重复了他们以往作品中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只是面对米尔斯海默更极端的现实主义，这些批评显得更加猛烈。而米尔斯海默在对一系列批评的回应中，也不过是重复了其论文中的观点。^⑥而到了2001年米尔斯海默出版《悲剧》，更加系统、完整地阐述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时，也完全坚持了《退向未来》和《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中的观点。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基本奠定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础。

《悲剧》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标定了需要回答的问题：1）为什么大国想要权力；2）国家想要多少权力；3）什么是权力；4）国家会选择什么战略来获得权力或保持权力；5）战争的原因是什么；6）受威胁的大国何时会选择制衡危险的对手，何时会把责任推给其他受威胁的国家。^⑦

^① 李永成：《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第85-86页。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③ *Ibid*, pp.11-12, note 27.

^④ 李永成认为，华尔兹的结构取向受霍布斯影响，从而霍布斯也间接影响了米尔斯海默。李永成：《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第87页。

^⑤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38-51; Charles A. Kupchan and Clifford A. Kupchan, "The Promi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52-61; John Gerald Ruggie, "The False Promis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362-70;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71-81.

^⑥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⑦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12-13.

米尔斯海默基于《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中初步提出的五大基本假定（*bedrock assumptions*）来回答这些问题，从而建构起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完整的理论基础。首先，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其次，大国拥有进攻能力；第三，国家永远无法确认他国意图；第四，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第五，大国是理性行为体。五个假定共同推出了大国的进攻思维。^①在这五大假定下，米尔斯海默总结了大国的三种行为模式。1）自助：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助；2）恐惧：由于无政府状态和只能依靠自助确保安全，加上其他大国同样具有进攻能力以及永远无法确定是否会进攻本国，因而国家之间会相互恐惧；3）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在恐惧之下，为了生存，理性的大国必然会选择权力最大化。^②可以看到，由于假定意图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大国间的恐惧，从而得出了权力最大化这一行为结论。因而，第三个假定将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区别开，并将其现实主义色彩推到了近乎极致。^③

权力最大化可以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得出的大国行为结论。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国家不可能知道多少权力才能保障安全，因此大国很快就会意识到确保安全的最佳方式就是取得霸权。^④具体而言，大国追求地区霸权、追求财富最大化以保证军费、追求最强大的地面力量并追求核优势。^⑤如果大国能保持明显的核优势，那么它自然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霸主。但是明显核优势几乎不可能保持，因而常规力量是目前分析大国关系的更好角度。^⑥米尔斯海默继承了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时对地形因素的关注，认为大洋的阻隔使常规军力的投送十分困难，因此大国能够取得的最好成果是成为地区霸权；这意味着全球霸权是不可能的。^⑦相对权力最大化意味着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只有成为唯一地区霸主的国家才是维持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因为其他大国同样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同样谋求成为地区霸主。因此，唯一地区霸主会充当“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阻止其他大国成为地区霸主。^⑧

^① *Ibid*, pp.30-32.

^② *Ibid*, pp.32-36.

^③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秦亚青：《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第 49 页。

^④ *Ibid*, p.35.

^⑤ *Ibid*, pp.140-147.

^⑥ *Ibid*, Chapter 4.

^⑦ *Ibid*, pp.135-137.

^⑧ *Ibid*, pp.40-42. 除了唯一的地区霸主，国际体系中不存在其他维持现状国家的可能性，*Ibid*, p.2.

而战争爆发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得出的结果。米尔斯海默重复了过去文章中安全竞争导致战争风险、两极结构更加稳定等结论。

可以说,面对后冷战提出的新的时代问题,米尔斯海默花了十年时间完整地构建起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他甚至被认为是三大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唯一进行了一致论述(coherent statement)的理论家。^①

3、新的问题:作为异常值的美国

随着苏联的崩溃,世界进入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时刻”,^②尤其是到了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权力似乎到达了顶峰。“单极时刻”下美国及其盟友的行为似乎并不能被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解释。^③

首先,北约并没有像米尔斯海默在《退向未来》中所说的那样解散,反而在苏联解体后进一步东扩。^④正如米尔斯海默在论文章建议的那样,美国也没有撤出欧洲。^⑤因此无论是《退向未来》《为什么我们很快就将怀念冷战?》还是《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其中对多极化导致不稳定的论述都失去了可以得到检验的事实。但米尔斯海默辩称称,这不是证伪其理论的依据。他认为冷战后欧洲的和平是因为美国的存在而没有走向多极化,因此他的理论还没有进入检验。^⑥

其次,美国开始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这明显不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美国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方式行事,不仅没有及时在东亚遏制中国的崛起,反而在中东、东欧等地区消耗了大量的资源。^⑦

对于第一种情况,米尔斯海默否认美国的行为是一种异常(anomaly);但对于第二种情况,米尔斯海默必须作出正面的回应。《大妄想》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它的任务是解释作为异常值的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

^①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3.

^②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1990/1991, pp.23-33.

^③ 参见米尔斯海默为《大幻想》撰写的中文版前言,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文版前言,第3页。

^④ 这一点被基欧汉和马丁用来攻击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见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⑤ 这里并不是说米尔斯海默的建议对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⑥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p.116.

^⑦ 似乎现实主义传统的均势已经不再重要,参见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新的回应：自由主义批判

米尔斯海默承认，美国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但他同时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特例。只要存在两个或以上大国，自由主义大国不可能实施真正的自由主义外交，但“单极时刻”下的美国自认为成为了唯一的大国，因而采用了违反均势逻辑的外交政策。^①这种外交政策旨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从而塑造只有自由民主国家的世界，建立开放的国际经济，并建立国际制度，并认为一旦达成这些目标，世界将进入持久的和平。^②这种外交政策背后是民主和平论、相互依赖论和自由制度主义。^③而这些理论背后就是强调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政治自由主义。

《大妄想》的结论很简单，即单极状态下的自由主义霸权不可能实现其目标，它不仅不可能依靠自由主义价值观建立世界和平，反而会使得世界更加不稳定，甚至伤害到自己的价值观。^④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根植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为此，米尔斯海默进行了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⑤

批判从两个区别但又相互关联的方面展开。自由主义强调存在唯一的一套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依照这套原理生存就可以过上最好的生活。自由主义的原理就是不可剥夺的个人的自然权利。米尔斯海默则首先假定，人的批判能力是有限的，能力有限的理性使得人们不可能在美好生活上达成共识。这种假定最明显的现实依据就是，至今人类依旧在宗教问题上争论不休。尽管理性有时能够起作用，但是地理环境、社会化、教育等因素都会让理性的能力大打折扣。^⑥

这引出了米尔斯海默的第二个假定：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个人在自然权利上是同质的。但米尔斯海默指出，在摆脱自然状态而建立秩序时（这是生存的要求），社会群体内部是可以达成很大程度的共识的。社会内的个人面临类似的问题，因而能够在第一原理上达成一定共识，这种共识使得社会群体能够安排自己的公共事务。但是，根据第一个假定，社会群体之间都不可能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第一原理。^⑦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pp.1-2.

^② *Ibid*, p.130.

^③ *Ibid*, Chapter 7.

^④ *Ibid*, pp.3-4.

^⑤ 米尔斯海默并不认为自由主义一无是处，相反他认为自由主义在国内是一种真正善的力量。他所批评的把它运用到国际关系中，*Ibid*, pp.11-12.

^⑥ *Ibid*, pp.20-33.

^⑦ *Ibid*, pp.33-38. 在这里，米尔斯海默没有否认国内矛盾的存在。

在这里，米尔斯海默将进攻性现实主义请出场。由于社会群体之上没有更高的统治者，因而社会群体的安全是自助的。^①为了确保安全，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恐惧是，追求生存的社会群体必然追求权力最大化。^②在这里，米尔斯海默不过是把进攻性现实主义中的国家替换成了社会群体。事实上，为了保障内部的运行，社会群体必须创造一种规则，即政治制度；同时，政治制度还能够保护社会群体免受外部威胁的攻击。

而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民族国家是社会群体的普遍政治形式。^③民族和国家是相互需求的关系。一方面，共享第一原理的民族需要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需要民族主义来进行统合和动员。^④而民族主义对自决的强烈要求浓缩在“主权”这一概念中，必然会反对其他第一原理的“入侵”和“统治”。

因此，向外输出自由主义理念^⑤的自由主义外交不可能塑造和平，反而会引发其他民族国家的强烈反抗，甚至进入持久的战争。此外，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要求在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社会工程以建立民主，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这要求自由主义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内动员能力，并塑造可能侵犯个人权利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这本身就是反自由主义的。^⑥

很容易看到，米尔斯海默的自由主义批判，不过是把《悲剧》叙事(narrative)中的“国家”替换成了“第一原理”。《悲剧》否认目前人类建立普遍全球国家的可能性，《大妄想》否认人类得出普世原则的可能性。而在第二个假定中，不同的第一原理化身为了不同的国家，从而以国家的身份参与了大国政治的悲剧。

也就是说，虽然米尔斯海默宣称是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自由主义批判的，但其批判本质上是对《悲剧》的重复。民族主义在这里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米尔斯海默用“民族-国家”的框架，整合了国家与民族两个概念，最终它们以同一种面目出现在了《大妄想》的叙事中。而且，通过将第一原

^① 有无政府是自由主义在国内、国际两种表现的根本原因。而由于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第一原理的共识，因而世界国家是不可能的。

^② *Ibid*, pp.39-42.

^③ 李卓批评了米尔斯海默在这里对民族国家的使用，认为米尔斯海默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是“族群国族主义”，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现实。李卓：《“自由霸权主义”为何注定失败——简评米尔斯海默〈大妄想：自由主义理想与国际现实〉》，第241页。

^④ *Ibid*, pp.95-102. 这种观点非常接近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参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⑤ 其实自由主义理念不仅向外输出并在此过程中攻击其他第一原理，而且也会受到其他理念的直接反击。例如，9·11就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理念的攻击，至少很多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6页。

^⑥ *Ibid*, pp.179-187.

理绑定在民族国家上，米尔斯海默将自称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主义第一原理拉回到了特殊性的层面，因为单个民族国家不具有代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普遍性。从这一角度来看，虽然米尔斯海默自称要填补《悲剧》不适用于单极时刻而留下的空白，但从理论内容上来说《大妄想》不过是《悲剧》的重复。不是通过上新色的方式填补空白，而是通过把已有的颜料晕染开，来使旧的颜色扩展到空白领域。

在《大妄想》之后，米尔斯海默还撰文补充了他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何必然崩溃的看法。除了重申《大妄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他还指出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不仅使得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危机重重，还助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①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推动了中国军事实力的上升。^②中国实力上升引起权力格局的变化，单极格局不会持久，因而美国会重新回到均势逻辑，因为单极格局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③

六、胜利逻辑与非理性时刻

尽管《大妄想》在内容上并没有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提供革新性的内容，但不能就此否定《大妄想》在米尔斯海默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它提供了超越理论内容的意义，这反映在它对于异常现象的处理方式上。

1、异常值处理与理论性质

米尔斯海默承认社会科学理论一定会有异常值，因此自己的进攻性现实理论不可能解释所有，但也解释了大多数事实。^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某种局限就在于它是一种结构理论，把世界简化成一种结构并忽视国家内部的特征，而有时这种特征会影响决策过程。^⑤但是这种简化对于理论构建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米尔斯海默而言，他本身就偏好简约的理论。^⑥

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异常现象。华尔兹的方法是，把它排除出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因为华尔兹的理论仅仅解释结果（outcome）而不解释国家具体的

^①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 2019, pp.7-50.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ter 3.

^③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④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8-12 ;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p.110;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427-457.

^⑤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10-11.

^⑥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p.107.

行为，后者属于单元层次的外交政策理论的范畴。^①因此，当遇到行为层次的异常现象时，华尔兹往往会将它排除出结构理论的范畴，而归因到外交政策理论。米尔斯海默认为，华尔兹的理论没有解释行为是一大遗憾，正因如此，他将国家理性的假定添加到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中，从而使自己的理论既能够解释行为，又能够解释结果，因此自己的理论的解释力强于华尔兹的理论。^②米尔斯海默通过添加理性假定的方式，在不寻求单位层次自变量的情况下，处理了华尔兹的理论所遗留的异常值。

处理异常值的方式最终反映到理论的性质中。至少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由于拒绝处理大量的异常值，华尔兹的理论并不是好的描述性理论（*descriptive theory*），但是好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③而他自己的理论则同时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这意味着他的理论不仅解释了大国为何会这样行动、未来会怎样行动，还告诉大国“应该”（*should*）如何行动。^④

2、胜利逻辑：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构条件

而《大妄想》的出现标志着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描述性上出了问题，因为它没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国美国会选择不符合均势逻辑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大妄想》选择将自由主义批判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这意味着结构无法解释这一异常，因此需要退回单位层次的变量——意识形态。

在这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非如软实力理论一样是实力的一部分。相反，米尔斯海默依旧坚持把实力看作是物质性的要素。这体现了他在本体论上的延续性，自早期的军事战略研究开始，物质要素始终是米尔斯海默关注的焦点。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外政策的影响是有结构条件的。自《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起，米尔斯海默就注意到了美国人对现实主义的厌恶，但是在结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选择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自由主义只能作为一种修辞（*rhetoric*）被运用。^⑤布莱恩·施密特（Brian C. Schmidt）指出，美国实际的外交政策和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测间总是存在差距，关注这些差距是现实主义者的悠久传统。^⑥而在《大妄想》中，米尔斯海默事实上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问世的结构条件作出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72.

^②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pp.111-112.

^③ Ibid, p.11.

^④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11.

^⑤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4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22-27.

^⑥ Brian C. Schmidt, “Realism as Traged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3, 2004, p.441.

了界定：美国的“单极时刻”。而且“单极时刻”不仅是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只要达到这种相对实力条件，自由主义大国“几乎总会这么做”（it will almost always do so）。^①

将这种结构条件放回其进攻性现实主义中来看，“单极时刻”几乎就是《悲剧》中设定的国家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唯一的地区霸权。在《悲剧》中，这也是所有大国追寻的目标。《悲剧》承认，美国是现代史上唯一的地区霸权，^②因而美国可以说达到了《悲剧》所设定的“胜利条件”。

“胜利”始终贯穿米尔斯海默的学术研究。他早期的军事战略研究中除了关注大国何时会/不会选择进攻，另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如何取胜、能否取胜，至少是能否挫败敌人的进攻。事实上，在他对“进攻”的关注背后，就隐藏着“胜利”的影子：进攻是为了获得胜利。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中，“胜利”获得了战场层面以外的意义：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并控制国际体系。因此，尽管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中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但胜利是生存的最佳方式。^③因此，在权力最大化的诉求中，大国的生存逻辑就是胜利逻辑。

3、非理性时刻：进步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条件的张力

在《悲剧》中，“胜利”大国的下一步是维持现状，或者说“胜利”大国没有下一步。《大妄想》遇到的问题则是本该“就此打住”的美国却希望改变现状。正如前文所说，理性作为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第五个假定，被他作为解释国家行为的关键假定。其他四个假定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美国这一异常现象的问题很可能就发生在理性假定上。

很容易理解取得“胜利”的美国为何是非理性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结构理论，其理性体现在对结构参数的计算，现实主义的政策就是基于此的。但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是单元层次的，不符合结构的规定。

美国的自由主义外交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步观念与其他仍然奉行现实主义逻辑的国家（结构的现实）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张力。正如米尔斯海默指出的那样，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以进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④而现实主义往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p.120. 另参见李永成：《冷战后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战略：自由霸权主义及其限度》，第108页。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41.

^③ 前文提到，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保证生存的最佳方式是取得霸权。而取得霸权意味着国际体系中的胜利。

^④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p.68.

往无法和进步主义相契合。^①进步自由主义要求国家进行社会工程来确保个人的自然权利，这种社会工程能够带来某种进步。事实上，米尔斯海默很早就批评了国际关系中的进步主义理论，如《退向未来》中，他所批评的“战争过时论”就是一种进步观念。正如前文所说，常常有人批评现实主义的宿命论和循环论，但米尔斯海默始终坚持着这样的观念。

总之，美国不再符合现实主义的理性，从而使得美国的“单极时刻”变成了“非理性时刻”。事实上，《大妄想》的标题就已经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非理性特征。除了“妄想”（delusion）直接作为主标题而出现，副标题中“梦”（dream）与“现实”（reality）的对比也暗示着美国的自由主义外交是不符合现实理性的梦。《大妄想》的最后一章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批评为“愚蠢”（folly），也表明米尔斯海默很难将其认为是理性的结果。^②

正是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是“胜利”条件下“非理性时刻”的产物，因此米尔斯海默自然而然地将其排除在了作为描述性理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之外，并通过作为规范性理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其进行批判。换言之，米尔斯海默通过进攻性现实主义规劝美国放弃虚幻的价值理性，回到工具理性的逻辑。这里的理性是《悲剧》的假定下的工具理性，即“胜利”大国应到此为止。

而在《注定失败》（Bound to Fail）一文中，米尔斯海默还基于描述性理论给出了美国会回到均势逻辑的预测。这意味着美国的“胜利”被削弱，“非理性时刻”的结构条件即将消失。因此，这依然是一种结构理论。

总之，“胜利逻辑”和“非理性时刻”是理解《大妄想》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关键。相比于理论内容，《大妄想》通过对“胜利逻辑”的延伸和对“非理性时刻”的暗示展现了米尔斯海默正面处理异常现象的最大尝试。它通过对理性假定的坚持排除了这一异常值，并通过论述异常值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从侧面再次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辩护。

^① 查尔斯·格雷泽（Charles L. Glaser）试图发展出一种乐观的现实主义，参见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4/1995, pp. 50-90; 查尔斯·格雷泽：《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竞争与合作的逻辑》，刘丰、陈一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原书于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米尔斯海默认为格雷泽的理论问题在于很难让体系中的国家接受格雷泽乐观的防御逻辑，尤其是跨出第一步的国家会担心自己面临危险，因此格雷泽似乎有些理想主义了，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Realists as Idealists,” *Security Studies*, vol.20, no.3, 2011, pp.424-430.

^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理性推导出了普世原则，依照这一普世原则进行外交活动是符合其所认为的价值理性的。而米尔斯海默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无法得出真正真理性、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这里的理性是价值理性。

七、结论与余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米尔斯海默学术历程及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在米尔斯海默学术生涯早期，他并没有现实主义的认同，甚至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并不了解。但是在研究具体的军事战略问题时，米尔斯海默就已经开始强调实力、恐惧、进攻等因素，这为他后来加入现实主义阵营打下了基础。而米尔斯海默正式开始发展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是在冷战结束之时，主要契机是冷战结束这一事实提出的新的时代问题，即欧洲安全何去何从。米尔斯海默是在这时接受华尔兹版本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并在对华尔兹理论的不满中融入了部分摩根索的思想，从而发展出了米尔斯海默版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华尔兹的结构理论是米尔斯海默思想的最直接来源，摩根索的思想在这里起到补充和修正的作用。

米尔斯海默的新著《大妄想》也是对时代问题的回答，尽管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内容，只是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叙事换了一种表述。然而《大妄想》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米尔斯海默对异常现象的处理方式。总之，米尔斯海默将这一异常现象排除在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之外，从而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辩护。

通过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胜利和理性始终贯穿米尔斯海默的学术研究。而“胜利逻辑”下的“非理性时刻”也正是连接起《悲剧》和《大妄想》的桥梁。同时，胜利逻辑代表的结构因素始终处于更高位置，只有在“胜利”的结构条件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单元层次因素才能反映到国家行为中去。这说明米尔斯海默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结构立场。

本文还希望从对米尔斯海默理论背后的“胜利逻辑”和“非理性时刻”的分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两点启示。

第一，“胜利逻辑”可以成为批判米尔斯海默理论的一个焦点。米尔斯海默将生存假定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又将取得唯一地区霸权地位作为确保生存的最佳方式。然而这种“生存=胜利”的逻辑是有漏洞的。在《大妄想》中米尔斯海默自己也承认，运用军事力量在小国进行社会工程都注定失败，更何况征服一个大国呢？唐世平指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国家通过兼并，数量减少、规模膨大，征服不再是有利可图的，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米尔斯海默世界向防御

性现实主义世界/杰维斯世界演化的主要机制。^①在这种世界中，理性的国家会得出生存不必取得胜利的结论。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就批评米尔斯海默的结构取向使他无法区分霸权国和谋求霸权国（being or bidding），不谋求霸权的中国真的会无法生存吗？^②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宋伟提出的“位置现实主义”（positional realism）同样面临类似问题。^③当位置现实主义把整体国家利益和谋求与实现利益的外交政策当作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的函数时，同样无法区分该国是否希望获得某种地位，因为位置现实主义关心的地位只是现实中的地位。地位是基于实力这样的客观因素划分的，与米尔斯海默一样属于物质主义本体论。^④谋求过高的地位目标对国家利益有害，但保有比自己实力低的地位（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低），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多大？不回答这些问题，很难断言国家一定会为了某些地位而进行争夺。问题或许是在物质主义本体论上。在现实主义无法放弃物质主义本体论时，更显得从其他本体论出发的研究的可贵。

第二，“非理性时刻”只对当下的技术水平条件适用，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超前反思，从而获得对国际关系未来可能性的理解。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非理性”不仅在于米尔斯海默所认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可能长久维持，还在于《悲剧》中强调的跨洋投射地面力量的困难。然而如果能够打破大洋的限制，军事力量将会压倒一切，即便是在强大的民族主义反抗，也能以较小的成本进行镇压，征服会变得容易。因而，量子技术、光速移动甚至瞬间移动技术的开发，将打破基于主权的边界、大洋阻隔的限制。这或许会成为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的一种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不会满足于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这时的国际关系或许会重回进攻性现实主义。类似的逻辑还有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对于 UFO 和国家主权的探讨。^⑤其实现实主义尤其受到人类中心主义的主权的想象力限制。为此，进行这种看似幻想的反思是有益的，我们可以思考哪些新鲜事物会改变我们的行为逻辑，这些

^①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第 162-164 页。

^② 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1, 2010, pp.53-75.

^③ 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④ 作为现实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位置现实主义也希望能够包摄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例如位置现实主义将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五个目标中的“追求地区霸权”认为是一种位置性利益。因此，位置现实主义很可能也走入“胜利逻辑”。

^⑤ Alexander Wendt and Raymond Duvall, "Sovereignty and the UFO," *Political Theory*, vol.36, no.4, 2008, pp.607-633.

逻辑在哪些现有理论中是被奉为圭臬的。尤其是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其循环论、宿命论的色彩使得现实主义者很容易拒斥“证伪”式的批评。他们会寻求长时段（long time-horizon）的检验，因而无法调和与短时段的结果的关系。^①同时，他们会宣称所谓的异常不过是时间还未到，就像华尔兹所说的：“均势：不是今天，而是明天”^②。明天究竟何时会到，现实主义者也没有答案，但是在明天到来之前，一切异常现象都能被宣布为“非理性”的。对“非理性时刻”的背景进行超前反思，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对现实主义者进行这样的回答：在某种条件下，只会出现新的明天，旧的明天永远不会到来。

^① Gerald Geunwook Lee, “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Time-horizon in Offensiv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2, 2002, pp.196-217.

^② 肯尼思·华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 53 页。